

国家审计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兼论 5 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审计应对策略

上官泽明,白玮东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选取 2013—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国家审计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国家审计能够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督促财政资金的持续投入、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程度和绩效水平是国家审计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3)在绩效导向文化消极、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国家审计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以为国家审计聚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真实合法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国家审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财政资金投入;财政资金管理;区域文化;信息技术;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3)03-0011-1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列为十年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并提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中国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际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与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1]。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是区域脱贫向乡村振兴顺利过渡的重要保障^[2]。财政部在 2021 年 3 月专门印发了《财政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确保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要求,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期间给予贫困地区强化财政保障能力的政策,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并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衔接”,以及要求“严格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然而,在过渡期的第一年,一些地方就开始出现财政政策衔接滑坡断档的现象,有 3 个脱贫县在 2021 年接收和安排的地方衔接资金同比大幅下降,最高达 47.78%^①,2021 年 4 月,央视财经频道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以“掺假的脱贫摘帽”为题报道了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扶贫造假的新闻^②,这些都反映了过渡期内财政资金在投入和使用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审计监督首先是经济监督,这不仅是对国家审计的精确定位,同时还是对国家审计职能发挥的本质要求。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通过回顾审计署近年来出台的同脱贫攻坚有关的政策和规定,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国家审计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决心和站位:审计署在 2017 年出台的《关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进一步加强扶贫审计的意见》中明确了

[收稿日期]2022-1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902108);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Y077);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项目(202204031401085);山西省审计厅审计科研课题(22SXSJ0305,22SXSJ0603)

[作者简介]上官泽明(1989—),男,山西临汾人,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务,邮箱:365088391@qq.com;白玮东(1996—),男,山西吕梁人,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理论与实务。

^①具体细节见审计署审计长侯凯于 2022 年 6 月所作的《国务院关于 2021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全文见 <https://www.audit.gov.cn/n5/n26/c10252052/content.html>。

^②视频新闻见 <https://tv.cctv.com/2021/04/25/VIDEaAF7mR150Ga96iIH1WT7210425.shtml>。

“十三五”期间扶贫审计的重点任务;在2018年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指导意见进一步深化扶贫审计的通知》中专门组织开展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为重点内容的专项审计;在2020年3月出台的《关于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扶贫审计工作的意见》有效助力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然而,关于国家审计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影响研究,现有学者多是从规范研究视角展开,如刘国城和黄崑基于问题导向视角提出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4],王波和杨霄提出后扶贫时代审计贫困治理效能的优化途径^[5],也有文献聚焦国家审计如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6]。此外,少数学者开展了实证研究,如吕劲松等基于西南四省/直辖市国定贫困县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扶贫审计对脱贫攻坚的重要作用^[7],邢维全基于全国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可以降低本地贫困人口规模,且可以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8]。但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2020年圆满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任务之后,已经没有名义上的贫困人口,而如何提高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的^[9];二是尚未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促进脱贫攻坚的作用机制和情境差异。基于此,本文将选取中西部22个省份的贫困地区,实证研究国家审计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机制和情境差异,以期为国家审计持续提升脱贫人口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区别于现有文献聚焦于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实证研究国家审计对促进脱贫攻坚的影响^[7-8],本文以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变化为焦点,研究国家审计对脱贫攻坚的治理效应。第二,已有文献仅是从财政资金投入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国家审计促进脱贫攻坚的机制^[7],很少考虑到财政资金管理这一重要机制,然而财政资金仍然存在“重投入、轻管理”的严重问题,本文将基于财政投入与管理的双重视角揭示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第三,现有文献已关注到文化价值观和信息技术对国家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10-11],但很少关注到它们对国家审计发挥治理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进一步考察文化价值观导向和信息技术等横截面差异如何调节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治理效应。第四,拓宽和深化“研究型审计”的应用领域。本文通过总结国家审计在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成功经验,为国家审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国家审计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依据市场失灵理论,市场活动存在着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等特征,因此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此时就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干预,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以实现社会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在我国,贫困地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难以自发全面摆脱贫困,脱贫攻坚是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12],贫困地区居民要想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摆脱贫困,必须依靠政府制定脱贫攻坚政策来推动。在政府制定的脱贫攻坚政策中,财政政策是排在首位的政策,财政资金的投入和管理则是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根据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使得国家审计应运而生,国家治理目标决定着国家审计的方向^[13]。当贫困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国家审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监督脱贫攻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14],确保实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国家审计自然会关注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会关注财政资金的投入和管理情况。

1. 国家审计、财政资金投入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财政资金的“输血”功能对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而言至关重要。“造血”功能在“输血”功能的推动下才能产生,从而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如果财政资金的“输血”不足,既可能减少本地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动力,导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也会让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觉得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是在“走过场”,难以激发金融扶贫和社会扶贫的积极性。财政部、扶贫办、发改

委等六部门于2017年6月联合下发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在“预算安排”中专门提到“地方各级财政根据本地脱贫攻坚需要和财力情况,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切实加大投入规模”。财政部和扶贫办在2017年9月联合下发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将“资金投入”作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首要考核指标,其中“省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和“省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与中央预算安排本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比例”则是重要的子指标。积极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政府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热情^[15]。

审计机关在开展专项资金审计和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时,会结合以上政策对财政资金投入的考评要求,重点关注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投入规模与以往相比是否实现了增长以及增长幅度如何,以此作为对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对于资金投入规模实现增长的,审计机关会在总体审计评价中形成正面意见。对于资金投入规模未实现增长的,审计机关会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审计意见和审计建议,地方政府在审计机关的监督下会按照要求进行整改,为满足财政扶贫工作中资金需求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以适应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需求,恢复和提升对本地区脱贫攻坚的“输血”功能,以及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造血功能”,从而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2. 国家审计、财政资金管理 with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一方面,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会出现过度拥挤的情形。在分配中,经常会出现“利己主义”等不合规行为,符合贫困户标准的由于人为设置条件没有进入帮扶范围,不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却被“照顾”进入了帮扶范围^[16],不能用来帮扶真实的贫困地区居民;在使用中则往往出现“形式主义”等低效性问题,一些扶贫项目缺乏充分论证就仓促上马,甚至出现以资金定项目的情况,最终往往因“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也不能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国家审计会将脱贫攻坚中存在的这些“利己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体现在审计工作报告中^[5],以引起人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财政资金在合规性和效益性方面的关注,督促相关部门完善财政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在设计和运行中的规范性,以及促进财政资金管理效率和使用效益的提高,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合谋,对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实施恶意操作。在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下,基层政府中存在着合谋现象,利用信息的不完全性实现对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恶意控制,从而为其自利行为提供便利^[17],却导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受到阻碍。脱贫攻坚是由中央到基层的各级政府推动和实施的,组织架构存在着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问题,较低层级的组织对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权越大,信息不对称也就越严重,越容易形成合谋,有意夸大当地贫困程度,借此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而扩大自利资本,或是向贫困户有意粉饰和掩盖财政资金的分配与使用信息,挪用财政资金用于满足基层政府部门整体利益和官员个人自利^[18]。国家审计具有超然独立的地位,凭借其专业性和独立性实现对财政资金使用与管理的监督,有效缓解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12],健全和完善财政资金的管理制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效益性,从而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国家审计可以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H1a: 国家审计可以通过督促财政资金投入的真实性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H1b: 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合规性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H1c: 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效益性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二) 不同情境下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异质性

1. 不同文化价值观下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异质性

以等、靠、要为典型代表的精神贫困一直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难点^[19]。尽管政府不断强调“扶贫先

扶志”,但是贫困户仍然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严重问题^[20],直接导致简单给钱给物的“保姆式”扶贫方式出现,这其实反映了帮扶干部存在不能有效改进帮扶方式、推进移风易俗的能力不佳等问题。在区域文化价值观消极的地区,贫困户更加倾向于维持现状,缺乏自主提升脱贫质量的意识和能力,帮扶干部也更加倾向于使用简单粗暴地给钱给物的“保姆式”扶贫方式,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财政扶贫效果,贫困地区居民收入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020年底出台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要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在区域价值观消极的地区,审计机关在审计中更应当对照以上要求和标准,帮助贫困地区不断改进帮扶工作,特别是通过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不断激励驻村帮扶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从而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文化价值观导向越消极,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越显著。

2. 不同信息化建设水平下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异质性

脱贫攻坚涉及的贫困人口众多、资金额度巨大,审计机关必须依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审计监督。专业胜任能力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两大因素之一^[21],而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化知识是新时代审计干部专业胜任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22]。为不断加强审计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强化国家审计治理效能,全国审计系统正在有序推进“金审工程”三期建设。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大数据审计思维,可以助力审计机关重点关注财政投入的质量、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等问题^[23];另一方面,审计机关不断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创新审计模式、加大审计力度和提升审计效率^[11],为国家审计促进脱贫攻坚注入新的动能。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越高,信息的传递和挖掘就越容易,就越有利于审计人员发现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尤其是揭示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更好发挥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治理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信息化建设水平越高,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一简称省份),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中西部22个省份坚决做好脱贫攻坚责任的落实和巩固,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编写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连续对中西部22个省份的贫困情况进行了监测,因此,本文选取中西部22个省份贫困地区的数据进行研究。

国家审计衡量指标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审计年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财政资金投入数据来自《中国扶贫开发年鉴》,财政管理规范性数据来自《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其余研究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是从2013年开始公布的,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西部22个省份展开研究,2013年《中国审计年鉴》缺失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因此本文的样本量为153。相关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采用stata16.0进行。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PA)。本文借鉴王中华和岳希明的做法^[24],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衡量。

2. 解释变量:国家审计($Audit$)。由于审计机关的数据公开有限,现有学者大多使用《中国审计年鉴》中对审计机关所有审计业务类型的查出问题金额的汇总情况衡量国家审计。虽然国家审计具有揭示、抵御和预防三大功能,但是严格来讲,揭示功能才是审计机关的核心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则主

要依赖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态度及其主管部门的督促态度。因此,本文借鉴郑石桥和梁思源的做法^[25],采用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与被审计单位的比值对国家审计功能进行衡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26-29],选取如下的控制变量:

(1) 经济发展水平(*Rgdp*)。地区经济发展能够为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提供更多发展动能,本文采用人均 GDP 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2) 产业结构(*Str*)。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3) 地区就业水平(*Emp*)。地区居民的就业状况对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选取农村个体就业人数占总个体就业人数的比值衡量地区就业水平。(4) 交通便利程度(*Tra*)。地区公路状况的改善能够有效增强贫困地区的可达性,缩短交通时间,破解连片特困地区的空间贫困陷阱,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本文选取每平方千米的公路里程来实现对地区交通便利程度的衡量。(5) 信息技术(*Int*)。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作为重要技术工具,能够有效推动贫困地区长效减贫机制的建立健全,提供持续不断的内生减贫动力。本文使用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的自然对数作为信息技术的代理变量。(6) 人力资本(*Cap*)。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其人力资源储备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的对数作为地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7) 金融发展水平(*Fin*)。

贫困地区所在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本文使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变量定义与说明见表 1。

(三) 实证模型设计

基于上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PA_{i,t} = \alpha_0 + \alpha_1 Audit_{i,t} + \sum_j \alpha_j Controls_{i,t} + \gamm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i* 代表省份,*t* 代表时间,*PA* 表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Audit* 表示国家审计,*Controls_{i,t}*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区就业水平、交通便利程度、信息技术、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等其他影响因素。 γ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μ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同时,本文采用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处理。模型(1)用来验证本文的假设 H1,当 α_1 的系数显著为正时,即假设 1 得到支持。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PA* 的最小值仅为 0.449,而最大值达到 1.383,差距接近 3 倍,这表明中国各个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得到了显著提升。从国家审计层面来看,平均每个审计单位发现的问题金额最大值为 85.507,最小值为 0.754,均值为 8.321,这说明近年来随着国家审计工作的不断深入,审计效果不断提升,其他变量的数据特征均在合理范围内,此处不再赘述。

表 1 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的具体说明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i>PA</i>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国家审计	<i>Audit</i>	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与被审计单位的比值
经济发展水平	<i>Rgdp</i>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i>Str</i>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地区就业水平	<i>Emp</i>	农村个体就业人数占总个体就业人数的比重
交通便利程度	<i>Tra</i>	每平方千米的公路里程
信息技术	<i>Int</i>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的自然对数
人力资本	<i>Cap</i>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的自然对数
金融发展水平	<i>Fin</i>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PA</i>	153	0.870	0.207	0.449	0.842	1.383
<i>Audit</i>	153	8.321	11.457	0.754	5.317	85.507
<i>Rgdp</i>	153	4.255	1.086	2.283	4.061	7.671
<i>Str</i>	153	40.216	6.541	20.331	40.465	55.762
<i>Emp</i>	153	0.294	0.159	0.047	0.274	0.649
<i>Tra</i>	153	0.878	0.821	0.063	0.748	4.992
<i>Int</i>	153	6.311	0.969	3.096	6.485	7.941
<i>Cap</i>	153	7.749	0.228	7.058	7.743	8.246
<i>Fin</i>	153	0.805	0.130	0.524	0.792	1.164

(二) 实证结果分析

表3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以看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Audit的估计系数为0.00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列(2)可以看出,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Audit的估计系数为0.001,仍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国家审计能够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假设H1得到支持。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力推动脱贫攻坚责任的落实,具体表现在持续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第一,本文借鉴陶开志等的做法^[30],采用审计处理情况来衡量国家审计,具体做法是使用审计移送处理事项与审计单位的比值作为国家审计的代理变量(Audit1)。第二,本文借鉴郭芮佳等的做法^[31],采用审计查出违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国家审计的代理变量(Audit2)。通过表4列(1)和列(2)可以看出,相关估计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2. 替换估计模型

考虑到因变量的取值具有受限制的特征,本文继续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如表4列(3)所示,相关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考虑内生性问题

第一,为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将国家审计滞后一期进行检验。如表5列(1)所示,L.Audit的估计系数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实证结果

	PA	
	(1)	(2)
Audit	0.001*** (3.170)	0.001*** (3.069)
Rgdp		0.049*** (4.455)
Str		-0.001 (-0.919)
Emp		0.038 (1.445)
Tra		0.029*** (3.587)
Int		0.019 (0.593)
Cap		0.041 (0.467)
Fin		-0.197*** (-3.508)
Constant	0.612*** (85.253)	0.342 (1.112)
Year FE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N	153	153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t值。标准误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下同。

表4 替换变量与模型的实证结果

	替换变量		替换模型
	(1)	(2)	(3)
Audit1	0.080* (2.030)		
Audit2		0.129** (2.557)	
Audit			0.001*** (3.29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Constant	0.214 (0.682)	0.287 (0.929)	
Year FE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N	153	153	153

表5 考虑内生性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Heckman 两阶段模型	
	(1)	(2)
L.Audit	0.002** (2.638)	
Audit		0.001*** (3.112)
IMR		-0.003 (-1.083)
控制变量	YES	YES
Constant	0.347 (1.061)	0.749** (2.265)
Year FE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N	153	153

第二,为进一步剔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缓解样本自选择的内生性。第一阶段,以国家审计的取值是否大于中位数构建虚拟变量,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结果的估计,测算出逆米尔斯比率;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引入模型(1)继续进行实证检验。如表5列(2)所示,相关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再次验证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 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 H1a、H1b 和 H1c,具体是从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财政资金管理平出发,实证检验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现有学者对于作用机制的检验,多是采用三步法展开实证研究,但对于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学术界抛出了众多的质疑^[32]。相比之下,更多学者倡导直接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然后再通过理论推导或者是现有文献支撑来证实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且主流期刊也逐渐认可采用这种直接检验的方法来进行机制研究,本文借鉴该方法,构建模型(2)进行机制检验。

$$Mechanism_{i,t} = \alpha_0 + \alpha_1 Audit_{i,t} + \sum_j \alpha_j Controls_{i,t} + \gamma_i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1. 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本文借鉴张程和侯海波的做法^[33],采用人均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并作对数化处理来表征贫困地区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FCI*)。如表6的列(1)所示,*Audit*的估计系数为0.00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强化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这也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H1a。

2. 财政资金管理平

(1) 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程度(*PBT*)。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报告》在衡量各地区财政预算管理规范程度时,是以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财政透明度指数作为依据。本文在此基础上,使用财政透明度指数的子指标“一般公共预算透明度”作为财政资金管理规范程度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①。如表6的列(2)所示,*Audit*的估计系数为0.008,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程度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H1b。

(2) 财政资金管理的绩效水平(*PSG*)。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变化是财政管理绩效水平的一个重要表现。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分类方式改革后,行政管理费这一支出门类已经取消,本文采用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地方财政公共安全支出之和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来衡量,该指标可作为地区财政管理绩效水平的反向指标。如表6列(3)所示,*Audit*的估计系数为-0.027,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绩效水平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这支持了假设 H1c。

(二) 异质性分析

1. 文化价值观导向

已有研究基于 GLOBE 文化维度将区域文化价值观划分为9个维度^[34],其中,绩效导向(Performance-oriented)是指社会鼓励自己追求卓越业绩的程度,体现的是鼓励并奖励个体追求高绩效的程度。对贫困地区而言,能够摆脱贫困就是它们最卓越的业绩。越是绩效导向消极的地区,贫困户越是倾向于维持贫困(或者“躺平”)的现状,缺乏自主摆脱贫困的志气,帮扶干部也更加倾向于使用简单粗暴地给

表6 作用机制检验

	<i>FCI</i>	<i>PBT</i>	<i>PSG</i>
	(1)	(2)	(3)
<i>Audit</i>	0.003 *** (2.852)	0.008 ** (2.728)	-0.027 * (-1.84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i>Constant</i>	-0.594 * (-2.008)	2.256 (1.462)	13.466 (0.897)
<i>Year FE</i>	YES	YES	YES
<i>Province FE</i>	YES	YES	YES
N	153	109	153

①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评估的是上一年度的财政信息,最新版本是2018年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2014年至2018年的财政透明度得分评估的是2013年至2017年的财政数据,因此,本文使用的“一般公共预算透明度”的数据区间为2013年至2017年。

钱给物的“保姆式”扶贫方式,而不愿意去努力创新扶贫工作方式方法。因此,本文选取绩效导向作为地区文化价值观的代理变量,将全样本按照中位数划分为绩效导向积极和消极两组样本,分样本进行实证结果的检验。如表7所示,在绩效导向消极的情况下,国家审计的估计系数为0.003,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绩效导向积极的情况下,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在区域文化绩效导向消极的地区,更有利于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发挥。这一结论也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即区域文化价值观越消极,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就越显著。

2. 信息化建设水平

本文采用各省审计机关的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与一般公共服务项目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审计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情况。将信息化建设水平按照中位数划分为高低两组样本,实证结果见表8。在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高的分样本中,国家审计的估计系数为0.002,且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低的分样本中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在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高的地区,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更显著。这一结论也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3,即审计机关的信息化水平越高,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就越显著。

表7 基于文化价值观导向的异质性分析

	绩效导向消极	绩效导向积极
	(1)	(2)
<i>Audit</i>	0.003 *** (15.835)	-0.001 (-0.750)
组间系数差异	P=0.000	
控制变量	YES	YES
<i>Constant</i>	0.336 * (2.047)	0.154 (0.352)
<i>Year FE</i>	YES	YES
<i>Province FE</i>	YES	YES
N	76	77

表8 基于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信息化建设水平低	信息化建设水平高
	(1)	(2)
<i>Audit</i>	0.000 (0.569)	0.002 * (1.903)
组间系数差异	P=0.008	
控制变量	YES	YES
<i>Constant</i>	0.365 (1.066)	0.172 (0.352)
<i>Year FE</i>	YES	YES
<i>Province FE</i>	YES	YES
N	62	52

六、结论性评述

(一) 研究结论

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致力于解决中西部22个省份对脱贫攻坚责任的落实,本文使用2013—2019年22个中西部省份贫困地区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治理效应、作用机制和情境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国家审计能够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机制检验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保障财政资金的持续投入,以及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合规性和效益性来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3)异质性分析发现,当文化价值观导向越消极时,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越显著;当信息化建设水平越高时,国家审计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效应也越显著。

(二) 政策建议

1. 要关注财政资金的投入和管理,持续提升脱贫人口收入。第一,审计机关要密切关注财政投入政策衔接滑坡断档的突出问题。一是要实现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财政资金审计全覆盖,了解财政资金投入的真实性。二是要密切关注财政投入政策衔接的落实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能否做到保留并调整优化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时揭露财政资金衔接滑坡断档的突出问题。三是要全面评估地方政府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的力度是否有所松懈,及时评估由此产生的居民收入锐减以及潜在的规模性返贫风险。第二,审计机关要督促相关部门加强对财政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一是要关注防止返贫致贫工作不扎实的财政资金管理不规范问题,及时揭露个别地方搞形象面子工程产生的帮扶资金实质

浪费现象。二是要关注产业就业帮扶项目绩效较低的问题,特别是产业帮扶项目在建成后出现闲置或废弃,以及就业帮扶项目和帮扶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走样等现象。

2. 密切关注地方文化特色和坚持科技强审,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一,审计机关要深入研究被审计对象的环境、特征,特别是要注意分析和评价所处地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导向。在文化价值观念导向较为消极的地区,审计机关更应该有所作为,通过提出审计建议来提升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建立注重业绩导向和长远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审计建议落实情况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考核范围,从而有力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二,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促进过渡期内审计监督效能发挥。审计机关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审计技术手段,推行“数据先行”的审计模式,打破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全面揭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顺利衔接的过渡期内财政资金投入和管理中存在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以及加大实时跟踪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力度,有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 [1] 孙久文,林丽群,傅娟.“十四五”期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研究[J]. 学术研究,2021(1):83-89.
- [2] 罗良文,史少杰.乡村振兴背景下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效率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 湖北社会科学,2021(5):83-92.
- [3] 刘家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5.
- [4] 刘国城,黄崑. 扶贫政策跟踪审计机制研究[J]. 审计研究,2019(3):11-19.
- [5] 王波,杨霄. 后扶贫时代国家审计促进贫困治理的制度供给研究[J]. 审计研究,2020(6):10-17.
- [6] “国家审计在决战脱贫攻坚中的作用研究”课题组,刘力云. 国家审计促进脱贫攻坚:做法、成效和启示[J]. 审计研究,2021(3):11-21.
- [7] 吕劲松,张金若,黄崑. 扶贫政策跟踪审计能促进脱贫攻坚吗?——基于西南四省/直辖市的经验证据[J]. 财政研究,2019(5):92-103.
- [8] 邢维全. 国家审计能否促进农村脱贫?——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6):9-17.
- [9] 何翔.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公平性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关系研究——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21(3):160-175.
- [10] 郑石桥,郑羽飞. 区域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审计结果生产和运用的影响——基于区域文化价值观和地方审计数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1(6):20-30.
- [11] 郑伟,张立民,崔雯雯,等. 信息技术与国家审计质量——基于违规金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4):1-8.
- [12] 闫天池,于洪鉴.“实”与“准”:脱贫攻坚阶段跟踪审计问题研究——基于审计报告公告的文本分析[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3-12.
- [13] 刘家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与实践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15(9):64-83.
- [14] 李晓冬,马元驹,南星恒,等.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审计报告公告文本分析的证据[J]. 理论月刊,2020(8):51-63.
- [15] 韩旭东,郑风田. 精准扶贫经验分析与价值总结——基于举国体制制度优势[J]. 当代经济管理,2021(9):1-8.
- [16] 周冬梅. 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逻辑与实践困境[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9.
- [17] 张力伟. 从共谋应对到“分锅”避责:基层政府行为新动向——基于一项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6):30-35.
- [18] 黄万华,陈翥. 农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农民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以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为例[J]. 经济论坛,2014(4):115-118.
- [19] 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4):97-103.
- [20] 王小林,张晓颖.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J]. 中国农村经济,2021(2):2-18.
- [21] 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1,3(3):183-199.
- [22] 刘力云,沈玲,王晓峥. 新时代我国审计干部专业胜任能力框架研究——基于281份调查表的统计分析[J]. 审计研究,2019

(1):41-50.

- [23]朱雅珣.大数据思维助力聚焦主责主业——以财政收入审计为例[J].审计研究,2021(6):3-6.
- [24]王中华,岳希明.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减贫[J].中国工业经济,2021(9):25-42.
- [25]郑石桥,梁思源.国家审计促进公共支出效率的路径与机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8(2):29-38.
- [26]李晓园,刘雨濛.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J].经济管理,2021(12):24-40.
- [27]范燕丽,丛树海,郝曼.从“争穷保帽”到“主动摘帽”:正向激励与农民持续增收[J].财政研究,2021(12):63-78.
- [28]魏成龙,罗天正.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J].经济经纬,2021(1):143-151.
- [29]程莹.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下影响地方政府审计质量的因素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4):67-76.
- [30]喻开志,王小军,张楠楠.国家审计能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吗?[J].审计研究,2020(2):43-51.
- [31]郭芮佳,池国华,程龙.公众参与对政府审计腐败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8(2):19-28.
- [32]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33]张程,侯海波.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估[J].财经问题研究,2021(1):85-93.
- [34]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J].管理世界,2015(2):101-119.

[责任编辑:黄燕]

How Can National Audit Improv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lso on the Audit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Relief in the 5-year Transition Period

SHANGGUAN Zeming, BAI Weidong

(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9 to study the impact of national audit on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National audi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eside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2) Urge the continuous investment of financial funds,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erformance level of financial fund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national auditing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3) In regions with negative performance-oriented culture or high level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ffect of national audit on improving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poor areas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national audit to focus on the true and legitimate benefi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pecial funds,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audi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financial investment; financial fund management; regional cul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